

· 技术哲学 · 文章编号:1000-8934(2015)03-0027-05

时代思潮中的技术批判理论

——安德鲁·芬伯格教授访谈录

高海青

(中山大学 哲学系, 广州 510275)

摘要:近年来,芬伯格教授的技术批判理论对技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技术哲学学术界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学界对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较少阐述,对其在当今时代思潮中的理论地位较少提及。鉴于此,通过对芬伯格的访谈,意在清楚地展示技术批判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现象学、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联和不同之处,旨在阐明技术批判理论在时代思潮中的价值。

关键词:时代思潮;技术批判理论;芬伯格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 1943—)教授曾经师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现为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技术哲学研究所教授,他在世界享有盛誉,并且他的思想也已被写入我国的哲学教材。自 20 世纪后半叶至今,芬伯格可谓是国际上最具创造性、最有影响力的技术哲学家之一,在综合哲学、史学和社会学等庞杂研究的基础上,他独辟蹊径,构建了一套逻辑自洽、气势恢宏的技术批判理论体系。他著述颇丰,其代表作有《卢卡奇、马克思和批判理论的来源》(1986),《技术批判理论》(1991, 2002),《可选择的现代性》(1995),《追问技术》(1999),《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灾难与救赎》(2005),《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2010),《实践哲学:马克思、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2014)。其中,《技术批判理论》于 1995 年在日本出版,《可选择的现代性》于 2003 年分别在中国、意大利出版,《追问技术》于 1999、2002、2004、2013 年分别在挪威、意大利、日本和法国、韩国出版,《转化技术》于 2005、2012 年分别在中国、西班牙出版。《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灾难与救赎》也于 2010 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高:经过多年来对您的思想的译介,技术批判

理论在我们国家乃至世界已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为更直观地把握您的思想,我们想请您简要概述一下技术批判理论体系的主要观点与核心概念。

芬伯格:从最抽象的层面上讲,我认为,所有的合理的形式都依赖于社会情境。从更实际的角度讲,这意味着,组织我们所有社会生活的技术规则本身就是受制于各种社会影响的社会现象,而不是纯粹经济理性和技术理性的表达。这就把选择引入了合理性的领域——我们通常被告知,该领域从来不提供任何选择,而只提供一种建基于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之上的“最佳方法”。我对技术统治论的观点作了驳斥,并对不同社会团体的不同价值与生活愿景如何决定技术进步的路径作了揭示。

概略讲来,技术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

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 theory):技术造物和技术系统必须从两个层面作出解释,它们分别是确保技术规则建立起来的因果层面,和社会制度中的意义层面。

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技术理性无法详细说明一种人造物或系统,是因为社会决定因素总是介入其中。

解释的灵活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y):对技

收稿日期:2014-09-21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韦伯式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逻辑演变”(2014M552274)。

作者简介:高海青(1983—),山东滨州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技术批判理论、技术现象学。

术问题本质的不同解释带来了不同可能的设计方案。

操作自主性(Operational autonomy):设计来实现自上而下控制的技术系统中,管理人员的权力地位能够通过其在进一步制定技术决策的时候实现再生产。

参与者的利益(Participant interests):卷入技术系统中的那些人都有许多由他们的参与——可能带来对系统进行重新设计的需求——而产生的特定利益。

具体化(Concretization):创新性的技术设计有可能使与技术系统相竞争的不同团体的利益与价值实现调和。

这个概括极为简略,不过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我的三本著作(《可选择的现代性》《技术批判理论》《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灾难与救赎》)和您已经翻译完成、希望很快面世的那本著作(《在理性与经验之间》)对这些概念都作了完整详细的解释。

高:我们都知道,今天之所以能看到有如此完备、详实的技术批判体系,完全得益于您二三十年来的不懈努力、坚持探索。您能否简要概括一下您的研究历程?我们很好奇的是,您为何选择技术哲学,以及其他欧美重要的学者,比如,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等,都转向研究自我意识、虚无主义、物化以及承认等传统哲学问题的时候,您为何还坚持技术研究?

芬伯格: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活跃分子。我参加了1968年在法国掀起的“五月风暴”。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这样一种理念对我后来的理论研究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后来,我在医学基地工作过,还从事过在线教育的创建工作。在当时,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段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经验在前苏联陷入了困境。而到80年代末,这种制度已经明显失败了。当时我就思考,我到底还能信仰什么?我接触医疗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经历让我确信,马克思对技术的强调是正确的,对他来说,生产技术是维系社会的粘合剂,不过它也改变着社会。但现在技术无处不在,它不仅协调生产,还协调教育、医疗、休闲活动、城市生活等各个领域。因此,我才想到要把马克思主义蕴含的极其重要的技术批判提取出来,并将其运用到我们当前的社会情境中。关于您提到的其他传统哲学问题,我认为,除物

化批判外,其他根本都无能于揭示我们社会问题的本质和激进改革的潜能。

高:马克思本人和最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关注更多的是政治经济学,他们对此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主题也是资本以及围绕资本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在法兰克福学派兴起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了对技术的考察,特别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和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那么社会批判从政治经济学转向技术的历史动因是什么呢?

芬伯格:现在政治经济学只能告诉我们,我们受资本的剥削。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丝毫变革的希望,至少在我生活过的国家是如此。关于这一点,我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核心无论如何都不是经济。它始终关心的是由技术决定的工作的本质,以及工作中的异化到底是如何限制个体的潜能的。看一看《哥达纲领批判》,就能够知道我这样说的理由之所在。现在,技术已无孔不入,马克思围绕工作型塑乃至损害生命提出的问题现在已经被推广至社会的各个领域。

高:那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哈贝马斯判定西方社会已进入抵抗运动退潮的历史时期也是合理的?既然如此,您又当如何保证自身的理论能够继续发挥变革西方现存发达技术社会的效力呢?在西方特定的制度体系下,在核心技术被全球化公司以及其他大型组织控制的总体情势下,您又如何继续保持批判理论的启蒙意义呢?

芬伯格: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抵抗运动是否退潮,它的本质是否改变?我还难以确定。在西方,工人运动已被削弱,并被边缘化。这一社会现实也带来了去权化和以新自由主义共识为基础的单向度政治的兴起。但是,其他的抵抗形式却围绕环境、互联网和性别歧视等新的问题应运而生。较之于原先的工人运动,这些运动要弱得多,并且比较分散,但是它们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且有可能在未来发展壮大。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讨论征服全球资本也许还为时过早。在今天,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也不应该通过联系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来判断我们的处境。

高:看来,我们可以把您的话理解为批判理论至少目前来说更应关注的是微观技术政治学,而非宏大的社会变革。谈到这个问题,我想到了迈克尔·卡伦(Michel Callon)为您的《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这一最近的作品撰写的后记。按照您的观点,民主极

为重要,事实上这一点对生活在先进技术社会的所有人来说都毋庸置疑,但卡伦却给出了一个模糊的结论,“最糟糕的情况从来都不能确定:民主不会必然导致均一化和残暴平庸参与的统治。”您的技术民主化是否也存在这种模糊性?

芬伯格:实际上,卡伦的这段话是乐观的,因为他说民主不会必然导致均一化和残暴平庸参与的统治。他提到的是一个比较陈旧的反对民主的理由。在电影《黑狱亡魂》中,反英雄的主角赞扬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暴君们,因为在他们的统治下产生了无与伦比的艺术创作,抱怨瑞士的社会和平与民主,因为它只能生产布谷鸟钟。

关键性问题在我看来应该是其他的方面。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现代社会中哪些文化资源可用于推动从剥削、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向能够更充分实现人类潜能的更好社会的根本性改变。启蒙运动告诫我们要依靠人民大众的自身利益,这种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延续下来。民主是集体追求自身利益的阵地。我认为,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它只是一种可能的却非必然的解决方式。要想进步,自身利益就必须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把握。仅仅对更多的财富感兴趣已经不再有任何根本性的意义(至少在西方是这样,对中国,我没有发言权)。只有当人民对自身利益有更广泛的理解,即把环境问题、主宰个人生活、文化习得与学习都纳入到自身利益的考量范围内,他们才能超越现存的制度。

高:关于此次访谈,我们打算从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构建来讨论,而是从批判理论的历史境遇和社会意义来考察,从时代思潮的视角考察,发掘技术批判理论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这段历史时期中其他影响广泛的理论的关联。这包括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反思,包括对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的继承,还包括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后现代福柯技术政治学、技术建构主义的批判吸收。当然,不可能对此进行彻底深入的讨论,只能简单地对这些关联做些勾勒。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在您关于技术的讨论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可否告诉我们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到底对技术批判理论有何启示呢?在您的《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2005)的序中,您认为,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在最深哲学层次有相当大的连续性”。您能否解释一下这一“层次”到底是什么?到底该如何将两位哲学家的思想整合到您的技术批判理论中呢?换句话说,到底该如何以技术为

中介整合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呢?

芬伯格: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敢于正视整个技术中介的敌托邦(反面乌托邦)含义。他们帮助我们意识到了,我们的生活现如今是由吸纳我们的技术系统组织起来的,我们的文化也已经被科技理性殖民化。如果你不能把握这种处境的影响,你就真的错失了发生在20世纪的最根本的变革。恐怕大多数的哲学家乃至科学研究中的许多思想家都错过了。但是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没有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但更需要超越他们。

我提到的这个最深的层次就是本体论层次。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都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但最终却在不同的地方停了下来。在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中,“ousia”(substances,实体)是具有一定形式与本质的恒定不变的实体。它们通过占有自身内在的潜能与机械论的客体概念区别开来。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都认为,在技术过程中物质对象从实体变成了纯粹的要素或原材料,他们试图思考一种摆脱乃至超越的方式,因为人类也是物质对象,现在却也像物一样被贬低为要素或原材料。

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都受现象学的影响,现象学认为,经验与现实的关系要比认知与现实的关系更为基础。在马尔库塞看来,经验是受社会制约的,而不是早期海德格尔所说的,是非历史的本体论中的本质。这使马尔库塞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纳入到他的分析当中。他谋划了经验结构在未来社会主义——它既不需要返回到过时的实体论,也不需要把物质对象当作要素或原材料,只需要借助于审美重新获得一个新的潜能概念——发生转变的一种可能性。然而,要想充分解释两者的关系可能需要一本书,一次访谈是很难完成的!

高:当然,对您丰富的思想来说,这是最简单不过的概括了。不过,我还是想继续追问几点关于您对海德格尔的理解。您一直都坚持认为,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应划归为实体主义和悲观主义,您对他的批判也是建基于这一判定之上的。但伊恩·汤普森(Iain Thomson)可能不同意您的观点,正如汤普森在《从技术的追问到对民主技术的探索: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和芬伯格》一文中所阐释的那样,相比于您和马尔库塞,他对海德格尔的看法似乎更为乐观,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您与汤普森产生如此大的分歧?我们常看到您评论当前的技术现象学研究,认为他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得太远了。这个“走得太

远了”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比如,作为当代技术思想家,唐·伊德(Don Ihde)一直以来可能都是技术现象学研究理路的代表。您对他的研究到底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芬伯格:我认为,就像其他许多当代学者一样,汤普森想让海德格尔传递进步的信息。如果你足够努力,你就可以使海德格尔看起来比他自己更好,甚至有可能像他那位出格的学生马尔库塞一样!但是,既然遵循海德格尔的话更为可靠,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海德格尔无疑是民主的敌人,他认为,现代社会正在被技术发展和技术思维破坏。这并非事情的全部,但这是他的主题,除狂热的海德格尔学者外,任何人在读到《技术的追问》(1977)的时候都会立刻意识到这一点。

伊德是一位令人关注的思想家,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主要关注的是个体与技术设备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关系的不同模式,他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他早期的著作《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很有启发意义,因为他着手发展的是一种集体的社会技术经验理论。但是他没有选择继续研究这一方向,而是选择密切关注个体经验以及认识论。与此不同,我遵照马尔库塞的建议,对社会性的经验概念更感兴趣。

高:细心的读者都会看到,您的批判理论既烙印着现代性理论的痕迹,也浸透着技术研究特别是建构主义的特质。以现代性理论来说,我们知道,您考察比较多的应该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您能从技术批判理论的视角简要分析交往行为理论的内在困境吗?在您的讨论中,您经常引用建构主义的研究案例,但是您又为何对建构主义不满呢?您的批判的建构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到底有哪些区别?您一直都致力于跨越现代性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的鸿沟,试图打破两者之间的分裂状态。您又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

芬伯格:哈贝马斯曾经以一种更清晰、更富成效的方式纠正了早期批判理论的某些重要方面,但他也使早期的技术批判丧失了应有的效力。这在他早期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1968)的著述中表现了出来,文中,他拒绝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并声称技术从整体上看是一项人类的中立的成就。不幸的是,这一强调被证明是错误的。事实上,早在1968年,技术就已开始成为重要的批判对象,而在环境运动、互联网、医疗改革运动兴起之后,现在我们已很难再去相信技术的中立性。因此,

我们可以从哈贝马斯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却不能做正统的哈贝马斯主义者。

主流建构主义者的科学技术研究被认为是实证研究,除比较微弱的技术统治论意识形态之外,它们几乎没有丝毫的政治含义。我一直都觉得建构主义的政治“弃权”(abstention)在政治与技术完全交织起来的社会中是不适当的。但是,批判的建构主义能够把实证研究与对宏大社会环境及其政治含义的意识结合起来。

鉴于现代性理论与技术研究的分裂状态,我尝试以解释学来整合它们。技术研究中解释的灵活性原则讲的是,对问题的理解影响着可用于解决问题的技术设计。如此一来就将解释学摆在了与传统意义上对技术经济问题强调有所不同的技术研究的中心位置。技术研究的解释学特征与很多现代性理论中解释学所起到的作用是一致的。在您提到的那篇文章(《在理性与经验之间》第七章)中,我谈到的是一个以海德格尔的方式做讨论的例子,在例子中,从社会对技术问题的解释上转变的角度,对创新做了讨论。我把解释学的理解看作这两个领域——直到现如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还都彼此不理不睬——之间交流的基础。

高:我们讨论时代思潮中的技术批判,肯定绕不开后现代主义的福柯,他的主要观点也可以被看作是技术批判的重要资源,尤其是他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且您在《转化技术》和《在理性与经验之间》中也多次引证福柯的观点。后现代主义的福柯到底与批判理论有何关联?福柯对您的技术研究有何启发?我们知道福柯的技术研究缺乏规范性的基础,或者说,他根本不讨论规范性的基础,甚至可以说,在他看来,规范性本身只是规训的产物,不具有积极意义。许多评论家也经常指责批判理论缺乏规范性的维度,您对此持何种看法?您的理论中是否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芬伯格:福柯很大程度上循着批判理论预先思考的路线将合理的技术规则看作社会现象。他是通过批判理论传统缺乏的、极为密切的实证研究完成目标的。正如福柯在晚年——在当时,他承认,如果他更早地研究批判理论,他有可能避免很多错误——才意识到的,他的研究与批判理论是互补的。

关于规范性基础的抱怨,使我联想到了哈贝马斯和英语世界中的政治哲学家们,他们希望各种版本的社会契约能够提供这样的基础。我认为,社会

契约到底应该被解释为理想的话语情景还是应该被解释为原始的状态,对解决该问题来说很重要。有效的规范性基础只能在关于传统上以民主与人权的名义实施抵抗和抗议的反思中而非思辨的建构中找到。

高:谈到福柯,我们还想补充一个问题,福柯的研究集中在社会科学领域,比如,医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建筑学等等,而这和您的关注是很密切的,您的理论主要关注的也是更具社会性质的技术,当然也包括技术性的学科。关于如何解决技术统治的问题,您提到了技术的民主化,但我们很想知道您对科学的看法,就像我们很想知道福柯对自然科学的态度一样。很遗憾我们已经不可能再追问福柯的观点,但是我们希望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做些回应。藉此,我们也想切实地理解科学领域该如何实现民主化?布赖恩·温(Brian Wynne)曾在《在理性与经验之间》的前言中对您的技术哲学做出这样的评价:“可是,关于在多大程度上(民主化)可同样应用于科学知识这个问题,芬伯格却表现得有些保守和模糊。”您同意他对您的看法吗?科学与技术之间是否确实存在界限,我们是否应该对两者进行划界呢?

芬伯格:我在科学家的家庭中长大。我父亲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的朋友也都是些科学家。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就参观过回旋加速器和核反应堆。当我思考科学思维的方式和科学家看待他们研究活动的方式的时候,我就禁不住想起这段早期的经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在今天,这段经历也不是无关紧要的。许多科学家与技术专家于此共同研制商业产品或武器的商业世界和科学世界之间存

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个鸿沟应归因于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之间现实存在的不同。科学研究比技术研发更为自主,因为它不直接指向商业或军事目的,不需要与大量复杂的监管和市场营销打交道。当然,科学也无法脱离社会的影响,但比起技术来更间接。我知道,当前的很多科学研究试图否定这种差异性,但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在政治上,它会带来危险的结论。为保护我们的健康与安全,我希望技术能够受到政府法规的积极管制和控制,但我肯定不希望政府过分管制和控制科学研究。如果我们模糊了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界限,我们又该如何做出这一基本的政治区分呢?

高:最后,希望您能够从技术哲学的角度以您多年来对技术实践的研究来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

芬伯格:妄图为整个国家提供建议是一种傲慢的表现!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ks)在俄罗斯做过这样的努力,但看到的却是荒唐至极的结果。既然您问起这个问题,我就谈谈自己的看法,但我担心,这在您看来也许是愚蠢的。无论如何,都只是我的想法而已。中国引进了西方技术,却没有引进与技术紧密相关的法律与规章制度,也没有在可用于解决由技术引起的常见问题的技术方案上投入太多精力。中国在现代化战略的基础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现在是慢下来并反思已有成果以去除沉疴的绝好时机。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应该通过清楚地表达包含在社会运动——在我(作为局外人)看来,它们是中国进步变革的最重要的资源,它们能够带来规章制度和社会基础层面的技术系统的重构——中的积极贡献来发挥自身积极的作用。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in the Zeitgeist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Andrew Feenberg

GAO Hai-q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ndrew Feenberg's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has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research of technology, and attracts comprehensive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However, the academic discussions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generation of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and the theoretical status of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in the Zeitgeist are very few.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wants to clearly reveal the conjunction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and Western Marxism, phenomenology of technology, constructionism and postmodernism, and clarify the value of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in Zeitgeist.

Key words: Zeitgeist;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Andrew Feenberg

(本文责任编辑:崔伟奇)